

## 社會主義同盟的內鬥機理新解讀

● 趙繼珂

社會主義國家的結盟政治是吸引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的熱門話題之一。《附帶傷害》為這一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紹了從1964到1991年中越關係發展和演變的全過程，並重點論述了中越同盟緣何走向破裂。



Nicholas Khoo, *Collateral Damage: 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社會主義國家的結盟政治是吸引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的熱門話題之一。邱 (Nicholas Khoo) 的《附帶傷害：中蘇敵對和中越同盟的終結》(*Collateral Damage: 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以下簡

稱《附帶傷害》，引用只註頁碼)為這一研究的最新成果。邱2007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學位，現任新西蘭奧塔哥大學 (University of Otago) 政治系講師。這本2011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以時間為經，分六章介紹了從1964到1991年中越關係發展和演變的全過程，並重點論述了中越同盟緣何走向破裂。

同中蘇、中朝關係研究相比，中越關係長期被中國學者所忽視。國內學界專門論述中越關係的著作可謂鳳毛麟角。已有研究中越關係的著作更多是將之同越戰結合起來論述，這其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李丹慧教授編著的《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把中越關係放在冷戰大框架下進行研究，對中、美、越、蘇的複雜關係給予梳理，是學者研究中國與越南關係的必讀之作。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方學者則對研究中越關係情有獨鍾。一些學者注重使用中國檔案資料，並參照美國檔案進行研究，如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的陳兼教授和奧本大學 (Auburn University) 的翟強教授便是領軍人物。但近幾

年隨着檔案獲得渠道的多元化，他們的研究優勢開始弱化。另一些學者傾向於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進行創新，佳作不斷。其中《附帶傷害》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代表。

作者曾在另外的場合表示，該書的研究重點就是要「闡釋如何運用現實主義理論模式來解釋1964至1991年間的中蘇和中越關係的演變機理」（“Author’s Response by Nicholas Khoo”,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XIII, no. 14 [2012]: 22，參見 [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III-14.pdf](http://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III-14.pdf)）。儘管承認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承接吉爾克斯 (Anne Gilks) 提及的「安全目標不可調和」(incompatible security goals) 理論 (有關該理論，可參見 Anne Gilks, *The Breakdow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 1970-1979*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但邱更強調此項研究在史料、研究時限，以及理論運用等方面對吉爾克斯的超越：「本研究選擇在一個更加寬廣的理論框架下探究如何使用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對中越同盟破裂給出解釋」(頁10)，「全書選擇案例研究分析方法對中越關係進行探討，並有意識地確保研究的準確性」(頁12-13)。相應地，作者把赫魯曉夫 (Nikita S. Khrushchev) 下台、蘇聯入侵捷克、越南統一和中越戰爭爆發這幾個拐點型事件，作為全書章節劃分的主要依據。

在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方面，另外一個有影響力的理論是所

謂「首要敵人」(Principal Enemy) 理論。該理論最早由美國著名中國外交政策研究專家范乃思 (Peter van Ness) 在其著作《革命與中國外交政策：北京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支持》中提出，認為冷戰期間中國對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更多是取決於其如何看待這個國家與北京所認為的「首要敵人」的關係，而非出於意識形態標準的考量 (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後來的一些學者更傾向於用這一理論來研究冷戰期間的中國和緬甸、巴基斯坦等雙邊關係。對這一理論，《附帶傷害》同樣予以引用，但有別於以往將其主要應用到雙邊問題研究的是，邱認為該理論的核心應歸結為「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the friend of my enemy is my enemy)，它更加適用於分析中、蘇、越三邊關係。在書中，作者認為蘇聯被中國視作「首要敵人」，而越南則因與蘇聯密切接觸而成為中國的「第二敵人」(頁4)。

中蘇衝突的發展與中越關係的演變是縱貫全書的主線。1964至1979年間的歷史是全書的論述重點，作者將其細化為1964至1968年中蘇同盟破裂、1968至1973年美越談判和美國撤出越南、1973至1975年越南統一和1979年中越戰爭四部分加以論述，但作者指出，「這幾部分引用的事實其實都是為反覆論證文章提出的因果模型 (casual patterns)。」(頁78) 該因果模型可理解為「中蘇

邱認為「首要敵人」理論的核心應歸結為「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它更適用於分析中、蘇、越三邊關係。他認為蘇聯被中國視作「首要敵人」，而越南則因與蘇聯密切接觸而成為中國的「第二敵人」。

本書的最大特點在於嘗試透過一種新視角對中越關係的演變做出解釋，對涉及越南問題各方關係的清楚梳理，更是向讀者明晰地展示了從1964到1991年間整個越南問題的發展趨向和主要事實。

衝突動力說」，具體而言，就是此時間段發生的刺激中蘇關係惡化的所有事件，「每一件隨即都會加強蘇越合作，而每一次蘇越合作的加強，又會更加刺激中越衝突加劇」（頁46）。中蘇爭鬥是刺激中越同盟破裂的真正動力。

在對中越同盟破裂的探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觀點。這部由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主編的著作認為，「中美和解首先最嚴重地損害了中越關係；這使越南後來認為，加強與莫斯科的關係對減輕來自北京愈來愈大的政治壓力至關重要」，並強調中美接觸使中國「付出的最大政治代價是北京與其共產主義世界的長期盟國，特別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疏遠了〕。」(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22-28.)

然而，邱不以為然，認為「雖然中國此舉是對越南的嚴重背叛，但這並非造成其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頁46），「中越同盟破裂並非中美接觸的必然結果」（頁69）。作者認為中美接觸確實加劇了中越關係緊張，但以下三個原因卻足以證明它對中越同盟的破裂影響有限。首先，中美接觸同一年，蘇聯同樣對美進行接觸，儘管蘇聯領導層內部擔心河內不願意看到莫斯科同美國改善關係，但越南卻沒有對此提出

太多質疑；其次，中美接觸後，遲至1978年秋中越同盟才最終破裂，並且在1975至1978年間越南仍多次嘗試改善中越關係；再次，越南倒向蘇聯是越共領導層的一致決定，目的是為了從蘇聯獲得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以便控制柬埔寨和老撾（頁68-72）。

《附帶傷害》把中越戰爭爆發視作中越同盟破裂的最終標誌。在越南統一之後的四年時間裏，柬越衝突加劇、越南過度尋求與蘇合作、越南沒收越籍中國企業財產、中越在南中國海爭端升級等一系列刺激性事件的干擾，使越南對中國部分示好的努力化為徒勞。1978年底，越南開始加強對柬埔寨的進攻態勢。然而，中國不想坐視柬埔寨在這場被國際關係學者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K. Brzezinski) 稱作「中蘇兩個超級大國代理人之間的戰爭」（頁131）中落敗，為「制止越南的狂妄野心並給它適當教訓」（頁128），於1979年2月17日出兵越南，雙方之間「牢不可破的友誼」（頁136）終於終結。

第六章是全書結尾，作者將研究時段略加延長，對1980至1985年和1986至1991年這兩個時間段的中越關係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在邱看來，儘管中越戰爭持續不到一個月，但其後續影響卻長久存在，最明顯的是在後越戰時代柬埔寨為此出現了長達十年的中蘇代理統治。書中指出，「只是當蘇聯確信減少同中國的衝突才更符合其根本利益後，蘇聯才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此後中越在1991年11月達成關係正常化協定。」（頁163）

本書的最大特點在於嘗試透過一種新視角對中越關係的演變做出解釋，對涉及越南問題各方關係的清楚梳理，更是向讀者明晰地展示了從1964到1991年間整個越南問題的發展趨向和主要事實。不過，對中越關係這個複雜問題，我們仍需要就一些有爭議的地方，與作者進行商榷。

和結論強調蘇聯對中越關係正常化起決定作用相一致，《附帶傷害》不惜筆墨，描繪了中蘇關係對中越同盟演變的影響。但在中越同盟破裂的問題上，作者對當事國越南卻沒有給予太多的論述。越南是否真的如作者所言，「其實沒有選擇，它只能在中蘇衝突的淺灘中游行」(頁44)？在中越關係演變過程中，越南做出了哪些回應？其在東南亞的一系列活動對同盟破裂有怎樣的影響？本書基本沒有論及這些重要的問題。「生存是驅動各國行為的最基本的動機，各國力圖維護自己的主權，……國家會從戰略高度上考慮如何在國際體系中生存。」(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譯：《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598。)按照現實主義學派的這一理解，將問題簡單歸結為中蘇衝突導致中越同盟破裂，似乎過於牽強。

與此類似，《附帶傷害》始終圍繞同盟關係演變展開論述，但書中對中蘇、中越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同盟究竟憑何維繫卻基本沒有提及。按照筆者的理解，本書的論述基點似乎是意識形態相似性乃同盟維繫的根本。事實上，在不危及國家根本

利益的情況下，這種同盟表面看來確實牢不可破，但由於蘇聯和中國都把國家利益看得高於社會主義國家同盟的國際義務，越南隨後在東南亞的一系列活動又恰恰觸碰到中國的核心利益，即使沒有蘇聯從中離間，中越同盟仍將難以為繼。歷史事實早已對此做出證明，蘇南衝突和中蘇同盟破裂正是依憑意識形態相似性結成同盟的脆弱基礎的最好例證。

在史料運用方面，「本書寫作使用了大量英語以及非英語資料」(頁9)，對大量中國二手資料的熟練使用更是引人注目。但對中越關係的探究，似乎仍需從其他渠道搜集更多原始檔案資料予以佐證，深入研究中國、越南和蘇聯當事國的檔案自不必言。而最近幾年，隨着冷戰研究的深入，運用東歐國家如波蘭、東德等國的解密檔案進行冷戰史研究成為新潮流。赫什伯格(James G. Hershberg) 2012年出版的新作《金盞花：喪失的越戰和談機會》就是這方面的典範，作者使用波蘭檔案，對1966年由波蘭和意大利秘密發起的調解美越的停戰談判展開考察，並提出了同傳統觀點差別巨大的新觀點(James G. Hershberg, *Marigold: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in Vietnam*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附帶傷害》雖然是一部學術著作，但由於作者清晰地梳理了涉及越南問題的各方關係，因而讀起來毫不晦澀難懂。除專門的研究者外，對試圖了解中、蘇、越關係演變的一般讀者來講，它同樣可以成為閱讀的首選。

《附帶傷害》不惜筆墨，描繪了中蘇關係對中越同盟演變的影響。但在中越同盟破裂的問題上，對當事國越南卻沒有給予太多論述。此外，書中對中蘇、中越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同盟究竟憑何維繫基本沒有提及。